

如何才能真正遵守党的纪律

——重温陈云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

□ 严国红

陈云同志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集中产生于1939—1943年间，他在此期间突出强调党的纪律建设，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1938年3月15日，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短时间内，党员数量从1937年底的约4万人激增到1938年底的50多万人。在发展党员过程中，存在着突击发展党员、党员阶级成分发生变化、党员素质出现滑坡等现象，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考验。

于是，他根据党员干部的实际情况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发表了诸多有关党的纪律方面的论述，这些论述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什么是党的铁的纪律？”“党的纪律的性质是什么？”“怎么才叫做真正遵守党的纪律？”“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根源是什么？”“违反党的纪律者如何办？”等六个关于党的纪律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体现了陈云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主要思想。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纪律？——“纪律是党的生存和斗争胜利的一个根本条件”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联合起来进攻革命的力量异常强大，这就决定了“共产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这不是容易的事”。在陈云看来，革命胜利基本的条件之一，就是要使无产阶级的党成为有组织的统一部队。要保障我们的党能有组织和统一，这就需要严格的纪律。

同时，中国无产阶级“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但人数较少，历史较短”，其缺点在于“容易保留和滋长自由散漫的习气，或受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不强调纪律，中国无产阶级就不能团结和领导小资产阶级。在严酷战争环境中，有了纪律，才能建立军队，“创建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政权”。

另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特别在同资产阶级实行联合的时期，资产阶级会从思想上政治上文化上向无产阶级进攻，这就要求每个党组织和每个党员严守党纪，防止被资产阶级所腐化”。而我党的大量新党员是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缺乏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将无法防止小资产阶级意识侵入党内。因此，“全党严守党纪是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编者按：陈云同志的主要著作收录在《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中。1937年12月—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在此期间，他对党的纪律建设问题作了诸多重要论述，体现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共产党的基本组织原则》《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等文章中。陈云的相关思想对于当前我们党的纪律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什么是党的铁的纪律？——“不准有不执行决议的人和小组”

在陈云看来，党的决议一旦作出，党员和党组织必须忠实执行党的决议。当然，“决议以前有争论之自由（而且必须讨论，应该争论）”。党员和党的各种组织可以有保留意见，但“只在会议上、向上级提出”。党的决议作出之后，不能阳奉阴违。

坚决不允许小组织在党内存在。陈云认为，不许有党内小组织是我党“与别党之界限”。在他看来，一切党内小组织主张的原则就是“反对党、反对革命的原则”。小组织对党的健康发展具有巨大危害，小组织在不得势时是“两面派”的，最终会“削弱党”“被反革命利用”“走向反革命”。一旦发现党内小组织，“开除之，以巩固党、加强党”。在实际工作中，判断小组织是否真正认错的标准是“不在口头而看其实际工作”。同时，工作中要旗帜鲜明地“反对瞎说小组织的大帽子”。

党的铁的纪律，在执行过程中，具体表现在四条原则上，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纪律的性质是什么？——“纪律是自觉的，又是强制的”

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最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所以，在无产阶级有组织的队伍内，也决不允许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自觉遵守纪律的分子存在。

陈云认为，“坚定的革命者视纪律为自由”。只有使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正如“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一样，

“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因此，为维护党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每个组织，都应该自觉自愿地接受其他党员和上下周围组织的监督，同时诚恳虚心地接受群众的监督。“一个共产党员坚决地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他的义务。”

纪律又有强制的一面，“纪律有强制性。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那么，纪律的强制性会束缚住我们的党员吗？很明显，不会。因为“我们的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象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淹死一样”。纪律的强制性还表现在对于违纪的后果处理方面，对于“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应开除出党”。

怎么才叫做真正遵守党的纪律？——“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在陈云看来，真正遵守党的纪律不是表现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党观察党员是否遵守纪律，要看他的行动。”而行动具体表现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

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论行动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在党的面前不讲假话，诚实地向党说自己所应该报告的事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遵守纪律方面，他反复强调，“守纪律不能有例外”，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任何人和任何组织必须无条件遵守党的纪律。

陈云特别强调“‘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在他看来，党通过民主集中的制度产生的决议是党的统一意志和行动的具体表现，

决议也是一种纪律，“就不仅是口头上的赞成，而要实际上去执行。你执行中央和上级决议才算是真正遵守纪律”。之所以要强调“‘迅速确切’地执行”在于，这是一种党性考验，就是要考验党员“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决议是拖延的，敷衍的，甚至故意歪曲的，还是真正忠实执行的”。

另外，陈云认为，在遵守纪律的问题上，需要特别注意“真心地遵守和具体地遵守”。所谓“真心地遵守”就是“要心口一致，言行一致”；所谓“具体地遵守”就是“要在各种具体的情形下面来遵守”，就是一定要服从支部，服从直接的上级，即使上级的人比你弱，你也一定要服从。

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根源是什么？——“错误实质未正确了解”

陈云认为，不遵守党的纪律的总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党的纪律所蕴含的真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真正理解“个人与党的位置孰者为重”。个人与党的位置没有并立的可能，党员个人的意志和生活都会随着整个党的意志和命运而发生转移。二是没有真正理解“民主与纪律之位置”。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民主不是超时空的，在有阶级斗争时，纪律是主要的，在党组织分配党员工作过程中，不能讨价还价，而要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分配。三是没有真正理解“守纪律不能有例外”。一切党员、一切党组织在遵守纪律方面不能有条件。

陈云还深刻剖析了不遵守党的纪律的现实根源。在遵守党的纪律方面讲条件，具体表现为：一是讲政治条件，以“政治上正确与否作为遵守的条件”，如坚持“正确者服从，不正确者不服从”。而困难恰恰在于“不正确者也

要服从”。二是讲能力条件，以“对方的能力大小与否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如看不起小组长，看不起党部；新干看不起老干、组长、支书。三是讲身份条件，以“地位的高下来作为守纪律的条件”，如对地位高者守纪律，对低者不守纪律。四是“错用历史条件”，如“我服中央，但不服从你（省或县委）”。

违反党的纪律者如何办？——“基本上是教育与自觉的（处罚一面也是为了教育），但处罚是必要”

党组织处理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的基本原则是“自觉、教育、处罚”三结合，其中，处罚是最后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能“因处罚也是教育，故随便处罚”。同时，坚决反对“惩办”和“放任”。

在处罚形式方面，要依据违反纪律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违反党的纪律的处罚形式有“劝告”“口头书面警告”“严重警告”“最后严重警告”“撤职”“开除”。

除“开除”必须经上级批准外，其他处罚可由各级党组织执行。上级监察委员会及同级党委可改变监察委员会处置违反纪律的党员的处罚。受处罚的党员有上告的权利，“但未开除者先须服从”。

此外，陈云还反对“破坏党纪的自由批评”，提倡“适当批评”，并进一步提出适当批评“限度”的三个原则：“党内可以讨论的党外就不行”“会内讨论的会外就不行（开会不说，背后乱说）”“决议前可以讨论的，决议后就不能自由”。同时，他也高度重视对党员的纪律教育，强调“今天在党内尤其是新党员中加强纪律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为什么要遵守纪律，怎样做才是遵守纪律，什么事是违反纪律的等等一类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陈云同志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是我党理论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革命年代，它为我党的建设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新时期，它仍然是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理论来源。

重读经典

用典释义

治国常有，而利民为本。

世间古今得失，以道为化，大归于一，故曰汜论。”

【讲话原文】

着力实现共享发展、绿色发展，增进人民福祉。中国古语说：“治国常有，而利民为本。”秘鲁谚语说：“人民的声音就是上天的声音。”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将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习近平《深化伙伴关系 增强发展动力——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6年11月19日）

【出处】

故圣人制礼乐，而不制于礼乐。治国常有，而利民为本；政教有经，而令行为上。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西汉）刘安《淮南子·汜论训》

【解读】

上述原典见于《淮南子·汜论训》。“汜论”，亦作“泛论”。东汉高诱题解曰：“博说

干部国学苑

□ 李湘云

家训是一种于亲情中培育规范、生养中予以教化的教育手段，一种于国家正式组织之外的道德教育。家训的内容是关乎人在这个社会“能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起始伦理，家训的目的是使家庭中的成员能够“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成为于己、于人、于家、于国的楷模之人，最终推动民族和国家不断前进。

中国儒家文化的起点是人性本善，人皆有恻隐之心，故道德成为国家管理最重要的手段。一种先“老吾老”然后实现“以及人之老”的道德体验，使统治者自然而然把社会道德教育下沉到家庭，下沉到个体，强调以个人修身来实现治国平天下、以家风端正来醇世风正人伦整秩序。于是，重家教、端蒙养成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随之诞生的便是中国独有的家训文化。

中国家训文化有着3000多年历史，最早萌芽于五帝时代，明清达到鼎盛，有文字记载的家训自周公《诫伯禽》始，至《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四大家训出现而达到高峰。家训在中国既支

撑着名门望族的发达，又渗透于草根百姓家庭之中。唐太宗李世民的《诫皇属》属帝王家训的代表，在中国家训文化中占有特殊位置，涉及皇帝对皇子们的教育，要求子孙“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可以说，一部《诫皇属》成就了“贞观之治”，成就了唐朝百年盛世。而506字的《朱子家训》，则写满“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等启蒙教导，亦深亦浅，亦理亦为，其治家修身之经可为所有时代孩童阅读。

由于家训是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目的，所以内容主要表现为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睦亲齐家、克己宽人。也许是亲睦才能家齐，家齐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在古代家训中，睦亲齐家、克己宽人的内容被强调最多。著名的私塾训蒙课本《袁氏世范》便以“睦亲”开篇，告诫后人睦亲与兴家、齐家的关系，为了达到睦亲，家训甚至详细阐述了家族财产应如何分配、主人应不受婢妾仆隶谗言迷惑、姑嫂妯娌间应避免言行失和等具体方法。除此之

外，在这部又被称为《俗训》的家训中，还有许多如“厚于责己而薄责人”“小人当敬远”等如何做人的启蒙教导。而作为克己宽人的延伸，一些官族的家训内容还不忘训诫后人清廉为官，如《包拯家训》中强调：“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二是勤劳勿奢、习业自立。这类家训造就了家族的兴旺，成就了个人的成功，培育了民族的志气。欧阳修家训《诲学说》中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不仅告诫他的后代，也告诫所有中国人学而立的重要性。有着“古今家训，以此为祖”之称的《颜氏家训》，以教子、治家等20篇家训，囊括修身、齐家、治国等内容，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之珍宝。然而，其最独特的价值是“重技”思想，“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研议经书”，要求子孙后代应学技以安身立命，这种“重技”观点出现在重农轻商的传统时代无疑具有重大意

义，有利于国家对各种人才的培养和实学精神在社会中的培育。

明清时期，随着农商关系的调整、社会主义观的变化、富商大贾群体的出现，商贸家训开始大量出现，极大地补充了中国家训文化的内容，对中国后世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清代无名氏为子孙所编写的《营生集》，就是一本专讲商德准则的蒙训读物，“当念家道艰难，立志努力向前，上养父母下育妻儿，一生免受饥寒”“能将货物勤整理，必定明年有好音”“青赔不是亏多句，免结冤仇惹祸殃”“恩情不念目无天，只以荷包作枕眠，薄待爹娘疏骨肉，福根削去枉徒然”等，从以商谋生到经商之道再到致富感恩无不包含在内，被后世商界认为是营生宝典，也成为中国家训文化中一份特殊的遗产。

家训

好书推荐



《想要生活好 必须做得对》，孙希有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本书着眼于纷繁的社会现象，深入阐释近年来党中央部署的一系列重大战略，提出了一些既贴近民情民生又有利于社会治理的思想和论点。比如，对现代社会一些过度现代化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对如何解决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行深入探索，提出了“平静才是发展的常态”“新型城镇化不是过度现代化”“理性消费的社会才是健康社会”等观点，值得一读。



《不朽的艺术》，肖鹰、孙晶著，东方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

本书是由清华大学首批MOOC课程《不朽的艺术：走进大师与经典》视频演讲文字实录编辑出版，既是美学家的艺术心语，也是多年来美学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心得。全书分为十五讲，精要介绍中西艺术史上经典的艺术作品和伟大的艺术家，以引导读者欣赏经典艺术的魅力、走进伟大艺术家的生命世界、体验人类心灵的瑰丽历程。本书对艺术品的分析，要言不繁，“简”而不“枯”，“深”而不“涩”。鲜活灵动的文字，再配以精美的图片，读之使人赏心悦目。



《互联网治理全球博弈》，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互联网治理领域著名学者劳拉·德拉迪斯基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安全研究所覃庆玲、陈慧慧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在网络时代，如果对互联网治理一窍不通，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全球权力动向。如何在鼓励互联网创新的同时保障国家安全？如何在追求网络商业创新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互联网治理如何影响全球化与地缘政治？互联网治理架构及其隐蔽下的技术逻辑如何撬动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本书带你站在全球互联网治理最前沿，看懂互联网时代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